

宗教信仰對同性戀內隱與外顯態度在同性婚姻的影響：來自臺灣 IAT 資料庫之分析*

唐正儀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張仁和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至 2019 年 12 月為止，全世界已有 28 個國家或行政區合法化了同性婚姻。在臺灣，同性婚姻議題於從不受重視，直至成為爭議，並於 2017 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釋憲案，且於 2019 年正式通過同性婚姻修法。有鑑於此，本研究係探討，對同性戀者的內隱、外顯態度及宗教信仰對於同婚合法化之關聯。不僅如此，臺灣主要的不支持同婚團體亦具有宗教色彩，雖然這些團體不以宗教教義為其不支持訴求，而是捍衛「一夫一妻」、「生養子女」等傳統家庭價值，即可見傳統家庭價值與宗教教義之關聯，而家庭功能與婚姻意義成為宗教教義的替身。故本研究探討宗教教義對於個體的內隱、外顯態度預測同性婚姻支持程度有調節效果，且此調節效果又會受到傳統家庭價值所中介。研究一（ $N = 2599$ ）透過臺灣內隱關聯測驗資料庫顯示，宗教對內隱、外顯態度預測支持同婚有調節效果，教義不支持同婚的宗教會強化內隱與外顯態度對支持同性婚姻的影響。研究二（ $N = 192$ ）進一步從性開放的角度切入對同性戀者的內隱偏見，發現宗教對內隱態度預測支持同性婚姻的效果亦顯著，即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宗教會強化內隱態度對於同性婚姻的影響，且該歷程又透過傳統家庭價值所中介。據此，期許透過結果能開啟兩造對話，以降低臺灣社會張力。

關鍵詞：同性婚姻、內隱態度、外顯態度、宗教、傳統家庭價值

* 本文通訊作者：張仁和，通訊方式：jenhoc@gate.sinica.edu.tw。

同性戀者婚姻權益的相關議題在世界與臺灣都愈漸受到重視。荷蘭率先於 2001 年通過同性婚姻法制化。此後，國際上不乏以同性婚姻或伴侶權益等相關方式使同性伴侶在法律上享有與異性成人結合的家庭相等或類似的權利。近年來諸如 2015 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的權利為憲法所保障，2016 年哥倫比、2017 年芬蘭都使同性婚姻於國內合法化。

在臺灣，長期致力於同性戀者婚姻權利的祈家威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向大法官申請對同性婚姻的憲法解釋，同年 5 月 24 日大法官公布解釋文指出：現行的臺灣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屬違憲，應於兩年內修法保障同性的婚姻權利。然而這樣的釋憲結果不為臺灣的不支持同婚團體所接受。不支持同婚團體雖然不以宗教為其主要訴求，然而擔任這些團體要職者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並以宗教名義聲明立場（如基督信仰的信心希望聯盟）。他們認為基督信仰因為教義中限制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會壓迫宗教的自由（李容珍，2017），進而強烈的反抗同性婚姻的法制化，也被認為是主要的不支持同婚勢力。過去針對臺灣社會的研究顯示，現行臺灣的基督宗教信仰者相對其他宗教團體信仰者對同性戀者的接受程度較低（Cheng et al., 2016）。於回顧型的文獻中也可發現，篤信宗教一直是與性傾向偏見穩定相關的變項（Herek & McLemore, 2013）。

在臺灣，同性戀伴侶的婚姻權議題從漠視，逐漸浮現檯面，時至今日成為爭論的焦點話題之一，甚至變成 2018 年的主要公投議題（共五項與此有關）。據此，本研究欲探討宗教教義與個體對同性戀者的內隱與外顯態度，對預測支持同性婚姻與否的意願。以下，我們將依序先回顧對同性戀者態度之相關研究，係分別從外顯（explicit）跟內隱（implicit）態度兩部分著手，再循序宗教信仰教義對此的可能影響。

（一）對同性戀的態度與偏見

態度是個體對人、事、物、價值觀持有的反應。態度可分為兩個層次：內隱（implicit）與外顯（explicit）。這兩類態度亦可被稱為無意識與有意識的態度、不被覺察或受覺察的態度、直接的與間接的態度、直觀的與分析的態度、程序性的（procedural）及陳述性的（declarative）的態度、或自動化（automatic）的與控制（control）的態度（Greenwald & Banaji, 1995）。而對於同性戀的負向態度，即所謂偏見與歧視，自 1970 年代起，相關研究與測量包含對好惡評價（Haddock et al., 1993）、恐懼（homophobia）（Wright et al., 1999）、負向情感（homonegativity）（Morrison & Morrison, 2003），以及自動化歷程（Lazarevic et al., 2015）……等，涉及層面涵蓋個體對同性戀者之負向認知、情緒及行為多重面向。而就近期研究來看，個體對同性戀偏見也與人口背景與社會經濟變項有關，如性傾向、性別、年齡、居住區域、教育、宗教、政治思想、與同性戀者接觸經驗……等（Herek & McLemore, 2013; Westgate et al., 2015）。

（二）對同性戀者（或非異性戀者）的外顯態度

個體對非異性戀者的外顯態度多以單題自陳題項或多題的量表方式測量（Ryan & Blascovich, 2015），要求參與者回報對於同性戀、雙性戀等性少數族群的評價性敘述，藉以捕捉個體的性傾向偏見。過去的研究顯示，個體對同性戀者的外顯態度會與許多不同變項相關，如性傾向為異性戀者、較低的教育程度、男性、較高齡者、居住在非都市區、展現較多威權思想、政治較保守、對宗教信仰生活虔誠、缺乏閱讀觀賞與同性戀相關議題之文學、電影、書籍等作品經驗都與較高程度的性傾向偏見相關（張德勝等人，2013；黃軍義、許得洋，2021；鄭旭博，2013；Donaldson et al., 2017; Herek & McLemore, 2013）。電話訪談研究也指出，當異性戀者與性少數族群有個人層面的關係與接觸時，則與同性戀偏見有負相關，即個體展現出較多對非異性戀者的正向態度（Herek & Capitanio, 1996）。在臺灣的追蹤研究則顯示，1995 年至 2012 年的臺灣社會因為世代交替的轉變，對於同性戀者的容忍度（tolerance）也有所上升，顯示臺灣社會對於同性戀者的外顯態度也漸趨友善（Cheng et al., 2016）。最後，在臺灣的近期研究也顯示，原住民與國小教師對於同性戀態度整體而言偏正向，且也會收到其年齡、婚姻狀態等背景變項所影響（巫秀珍、郭洪國雄，2018；林佩薇、郭洪國雄，2017）。另一方面，林珮婷（2020）透過比較臺灣在地大型資料庫（包含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探討 1991 年至 2017 年間對於同性婚姻態度的轉變，也發現到、社會經濟地位、政黨、宗

教多重交織的影響特性。李怡青（2020）則更聚焦於性別角色、同性戀刻板印象等概念對於同婚支持的影響，結果發現若有較低的同性戀刻板印象（例如不認為同性戀都是淫亂的），較高的性別平等（例如認為男人和女人都應該對家庭收入有貢獻），愈會支持同性婚姻。

個體自陳的外顯態度雖與支持同性婚姻有所相關，然而測量外顯態度仍有其限制。個體可能透過印象整飾或因社會期許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調整其態度，是以較不受個體意識歷程控制的內隱態度則可以降低這些影響因素，進而更完整理解個體之真實態度。Greenwald 等人（2009）的後設分析研究也指出，在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上，人們往往會扭曲自我報告，故在此類議題上使用內隱測量相對自陳外顯測量是較佳的選擇。

（三）對同性戀者的內隱態度

有別於外顯態度可為個體所覺察，不受個體控制的內隱態度可經過數種方式測量。其中，內隱聯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簡稱 IAT）為常見的內隱測量方式之一（Nosek et al., 2011），係由 Greenwald 之研究團隊所發展（Greenwald & Farnham, 2000; Greenwald et al., 2009），可用於測量參與者對兩類事物的不同內在評價。一般而言，人們傾向將有相同特性的事物較快速地聯想在一起，內隱聯結測驗則透過這樣的前提，測量個體對兩類事物（如男人或女人、非裔美人與白人）與其配對概念（通常為好的類別與壞的類別）的聯想速度，並進行相對比較，以探索個體對兩類事物相對的態度傾向。使用內隱連結測驗測量個體內在的態度需透過 D 分數的計算，係是透過類似效果量 Cohen's *d* 衍伸而來。其計算方式為將兩類事物與配對概念之連結速度平均反應時間，除以各自的標準差以獲得兩組效果量，並將此效果量相減得到差值，藉以表示個體的內隱偏好。Greenwald 等人（2009）後設分析研究中發現，當測量社會的敏感議題時使用內隱測量的方法測量態度相較外顯是比較好的。早先由 Banse 等人（2001）將內隱技術運用至同性戀態度測量，而後 Westgate 等人（2015）更是透過 IAT 線上大型資料庫分析巨量美國參與者對同性戀內隱態度的影響（自 2006 年到 2013 年，約 68 萬人），結果也顯示性別（女性）、年齡（年輕）、政治偏好（自由派）、教育程度（高教育水平）……等可以正向預測對同性戀者的內隱態度。在美國近期的研究也發現，同性婚姻立法通過後，不僅是對於同性戀外顯態度有明顯提升（Tankard & Paluck, 2017），也同時對於同性戀內隱歧視有所弱化（Ofosu et al., 2019），由此突顯機關與政策對於緩解偏見跟歧視的正面效益。

就一更精緻化的角度來看對同性戀者內隱態度，除卻典型的正向與負向等較為廣泛而抽象的連結外（例如好的、壞的），Pinsof 與 Haselton（2016）的研究中將同性戀的內隱連結測驗，改探討與性行為相關的傾向「性濫交（promiscuity）」與「一夫一妻制（monogamous）」兩種類別，以探討個體是否傾向將同性戀者與某類特定性行為傾向連結，結果顯示對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懷有偏見的個體愈不支持同性婚姻。該研究不僅突破以往將個體對同性戀者偏見以籠統的正向、負向概念分類，進一步使用特定概念（性行為）的相關詞彙進行內隱聯結測驗，更具體地探討個體對同性戀者的偏見內容，直接揭示了大眾對同性戀者較為核心之偏見是與性行為傾向的關係，此是多數與同性戀內隱偏見研究中獨特且別具特色的發現。這也呼應近期李怡青（2020）的研究發現對同性戀者態度測量進行因素分析時，其中一題「同性戀者私生活都很亂」也會聚斂在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中，間接顯示大眾對於同性戀性行為上的負向連結。

（四）宗教教義與同婚態度

誠如前述提到，宗教對於個體支持同婚及對同性戀者態度有非常穩定的相關（Westgate et al., 2015）。而在回顧型研究中也發現，對於宗教虔誠度更能直接預測對於同性戀的外顯偏見（Herek & McLemore, 2013）。在電話訪談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宗教信仰對同性戀態度的預測力，比人口背景變項更高，當個體愈積極參與宗教活動時，愈會顯現對同性戀族群的不支持態度（Olson et al., 2006）。然而，並非所有宗教都不支持同性婚姻，尤其在臺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是有豐富的面貌。細部來看，在臺灣民眾信仰的主要宗教裡，其中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系統，由於其教義都有明確規範與同性戀行為，如新約與舊約聖經中也有經文指出不支持同性戀性行為的內

容，如舊約利未記 18：22，「你不可與男人同睡交合，像與女人同睡交合一樣，這是可憎的事」，或新約羅馬書第 1 章第 26–27 節：「為這緣故，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與女人順性的交往，慾火攻心，男和男彼此貪戀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過失當得的刑罰。」基督教承襲天主教以新舊約聖經為經典，多數基督教派亦將同性戀或同性性行為視為不潔與罪的表現。伊斯蘭教教義遵從古蘭經與先知的聖訓，亦將同性性行為視為罪過。如古蘭經第 26 章第 165–166 節：「你們怎麼要與眾人中的男性交接，而捨棄你們的主所為你們創造的妻子呢？其實，你們是犯罪的民眾。」參照 2018 年 12 月為止的同性婚姻合法國家也可發現，並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屬於伊斯蘭教政權。事實上，伊斯蘭教政權的國家中，對於同性戀有著輕重不一的懲罰，最嚴重可處以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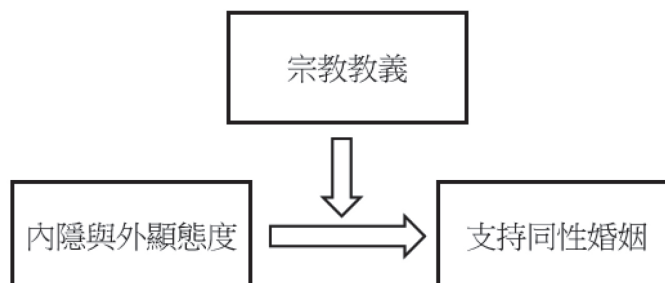
臺灣最主要的幾個不支持同婚團體如「守護家庭聯盟」（簡稱護家盟）、「下一代幸福聯盟」（簡稱下福盟或幸福盟）、「信心希望聯盟」（簡稱信望盟）等，雖然不以宗教教義為其主要不支持同性婚姻於臺灣合法化的訴求，然而擔任這些團體要職者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並以宗教名義聲明立場，例如在同性婚姻公投辯論中，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半數講者曾表態自身之宗教信仰。在這之中，基督宗教因為教義中限制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會壓迫宗教的自由，故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法制化。加上基督教的信仰者在臺灣佔有一定的比例，被視為對同性婚姻落實於臺灣社會的主要不支持力量。針對臺灣地區的追蹤研究發現，1995 年基督徒相較其他宗教的信仰者而言並非特別不支持同志的一群人，然而 2012 年的基督宗教信仰者相對其他宗教信仰者，對同性戀者的接受程度較低，其中原因來自於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對同性戀者的包容力都上升了，這也突顯出基督宗教的相對不包容（Cheng et al., 2016）。

相對於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蘭教，在臺灣的佛教與道教等民間信仰，則大致上對於同性戀態度沒有特別明顯的立場。實徵研究也發現，基督、天主宗教、伊斯蘭教較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宗教（Herek & McLemore, 2013; Whitley, 2009），而佛教與道教則是歸為相對無立場（Adamczyk & Pitt, 2009; Rich et al, 2020; Swinburne, 2017）。有鑑於此，在本文後續研究中，主要也會將基督、天主宗教、伊斯蘭教設為較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宗教，而佛教與道教則設為較無明確支持立場方的宗教。

（五）宗教教義對同婚態度的調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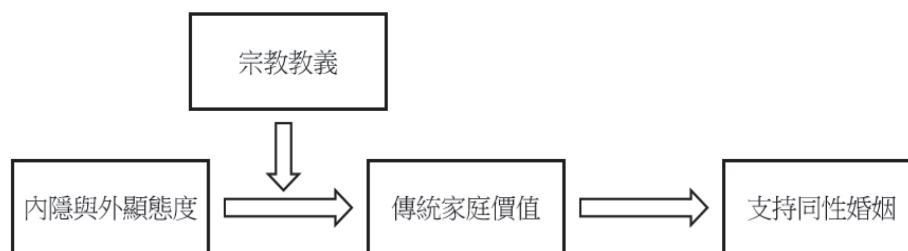
檢視臺灣的不支持同婚團體將同性團體標籤化，近期葉德蘭（2017）歸納出幾點理由。首先，是透過與「性」相關的議題，如認為同志族群淫亂的性生活，強化愛滋病與同性戀者的連結，這也呼應如前述李怡青（2020）之研究。第二類則是質疑同性戀者的家庭價值與功能，如支持一男一女的結合才是家庭的單位，若非一男一女結合的家庭無法發揮教養功能或會產生各類問題，或者同性伴侶無法自然生育後代，則對傳統的華人家庭價值產生衝擊。然而無論是「淫亂的性觀念」或只接受「一男一女」組成家庭，都與其宗教中的教義規範有所關連。而從態度與行為的研究來看，倘若個體對於同性戀有負向態度與偏見與歧視，通常在社會期許的影響下可能有較收斂的表現，然而，若其所明確投入不支持同性戀教義的宗教團體，則較能夠明確表達此立場，甚至若本身就有此態度的話，更可以透過宗教信仰進而強化其態度之方向性。Todd 與 Ong（2012）透過蒐集六千位的研究參與者，也發現對於宗教保守者來說，其投入該信仰愈高，愈不支持同性婚姻，這樣的結果也呼應後續 Chonody 等人（2013）的發現。據此，本研究認為，當個體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具有歧視性時，其對同性戀者的隱而未發、甚至未覺察的負向觀感會與所信仰的宗教教義產生交互作用，即當個體信仰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宗教，其教義特性會強化個體的負向態度，進而更不願支持同性婚姻，這也與張淑芬（2017）研究發現有時教義會對個體得產生強化信仰方向的影響，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宗教教義調節內隱與外顯態度示意圖



更進一步地，本研究嘗試探討個體從對同性戀的態度到同性婚姻支持與否的機制特性。由於臺灣社會中不支持同性婚姻團體有其宗教背景，而且主要訴求為「一夫一妻」、「生養子代」、「家族關係」……等傳統家庭價值面向（李怡青，2020；葉德蘭，2017）。Lin 等人（2020）近期的研究透過質性訪談 12 華裔同性戀者（其中 5 位為臺灣籍），結果發現要符合傳統華人家庭規範（如生子、一夫一妻）為其主要困擾。據此，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宗教其主張剛好呼應了華人傳統家庭價值觀，進而提供了從宗教教義到家庭價值的聯繫歷程。有鑑於此，倘若此論述成立，本文則可近一步分別探討兩種態度（內隱與外顯）與宗教教義的交互作用，是否能再透過家庭價值影響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據此，延續假設一的前提，則再加入傳統家庭價值作為中介變項，探討傳統家庭價值作為宗教教義中介內隱與外顯態度預測支持同婚之可能，如圖 2 所示。本研究假設，當個體信仰宗教的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則會透過提高認同傳統家庭價值進而抑制同性婚姻的支持。

圖 2
傳統家庭價值中介宗教教義與內隱態度交互作用示意圖



整體而言，臺灣社會近年對同性戀者的婚姻權益逐漸重視，也成為主要爭論的議題之一，且由於不支持同性婚姻之團體其背景有其宗教背景，是以本研究欲藉探討宗教教義作為調節變項之可能，進一步探究此一調節模式中傳統家庭價值之中介歷程，進而設計兩個研究。研究一以宗教作為調節作用之初探，嘗試了解宗教教義作為調節兩種態度（內隱態度與外顯態度）預測個體支持同性婚姻態度之可能。研究二主架構與研究一相近，先檢驗宗教作為調節變項的穩定性，且同時調整同性戀內隱態度於傳統負向刺激，轉為對不支持同婚中強調的性開放態度（Pinsof & Haselton, 2016）。不僅如此，研究二再加入傳統家庭價值為中介變項，檢驗其扮演對整體歷程之影響。期許透過研究一、二的分析，對不同宗教信仰的臺灣民眾無論其支持與否同性婚姻的立場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研究一

過去研究顯示內隱聯結測驗可有效預測個體之行為，且相較自陳式的測量較可以避免參與者因社會期許或印象整飾等緣故而得到的反應（Greenwald et al., 1998; Nosek et al., 2011），故本研究同時以對同性戀內隱和外顯之測量方式預測個體支持同性婚姻的意向。此外，同時探討宗教信仰教義是否為影響內隱與外顯態度對支持同性婚姻的調節變項。研究一預期同性戀內隱偏好、同性戀外顯偏好、宗教教義可預測對同性婚姻支持態度，且宗教教義對以內隱與外顯偏好預測同性婚姻支持態度有調節作用，即當信仰的宗教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會強化同性戀內隱與外顯偏好對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的關聯；相對的，宗教信仰相對支持同性戀者，則弱化同性戀內隱與外顯偏好對同性婚姻支持度的關聯。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臺灣版內隱聯結測驗網站進行「性傾向」分測驗的測驗者，該網路平台於 2006 年建立在美國哈佛大學心理系，臺灣繁體中文版則是自 2011 年開始運作，全部資料由參與者自願填答，過程並沒有任何要求，例如近期 Charlesworth 與 Banaji（2019）則也透過此分析自 2006 年在美國相關內隱態度之趨勢變化。研究一係以 2011 年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自願填答之臺灣參與者為資料分析對象（網路 IP 位置於臺灣，且在個人所居地區一欄填寫臺灣）。依照以往對於內隱連結作業資料分析之建議（Chen & Chang, 2020; Greenwald et al, 2009; Westgate et al., 2015），本研究僅列入（1）完成所有階段作業且無遺漏值，（2）內隱測量反應時間低於 300 毫秒之比率低於 10%，以及（3）年齡高於 18 歲的參與者進行分析。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共 2599 位。67% 為女性；年齡分布為 19 至 64 歲（ $M = 24.09$, $SD = 5.12$ ），性傾向可自選為異性戀共 1138 位（43.8%）、雙性戀共 698 位（26.9%）、同性戀 763 位（29.4%）。宗教信仰自陳為無信仰者 1394 位（53.6%），佛教 491 位（18.9%），道教 479 位（18.4%），基督教 206 位（7.9%），天主教 27 位（1%），伊斯蘭教 2 位（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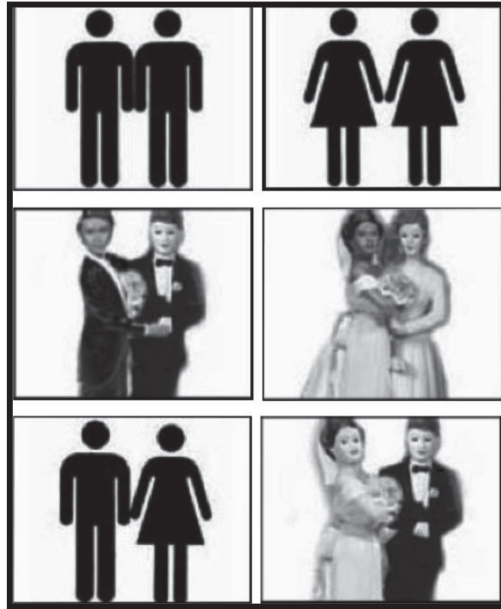
2. 研究程序

研究流程有兩部分，以電腦網頁測量內隱聯結測驗，以及網頁填寫自陳量表。系統會隨機研究參與者進行兩部分的先後順序，相關研究材料依序說明如下。

3. 研究材料

（1）內隱聯結測驗。進行內隱聯結測驗需要將不同類別的刺激詞彙或圖片歸入相對應的類別。本研究中「好」類別的詞彙刺激為：喜悅，愛，和平，美妙，愉快，光榮，歡笑，快樂；「壞」類別的詞彙為：苦惱，糟糕，恐怖，骯髒，邪惡，可怕，失敗，傷害。代表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刺激材料則可能是文字（「同性戀者」、「同性戀」；「異性戀者」、「異性戀」）或圖片，如圖 3 所示。使用內隱聯結測驗測量個體的同性戀內隱偏見需計算 D 分數（Greenwald et al., 2003），本研究為了使相關測量的理解方向一致（均為分數愈高表示對同性戀者愈正向），故將 D 分數進行反向計分，若 IAT 的 D 分數大於 0，表示個體將同性戀者與好的詞彙（異性戀與壞的詞彙）連接的速度較快，而將同性戀者與壞的詞彙（異性戀與好的詞彙）連結速度較慢，即是對同性戀者有內隱的正向態度。反之，若 D 分數小於 0，則表示個體對同性戀者有較負向的內隱態度。

圖 3
IAT 刺激圖示



(2) 自陳變項。包含同性戀外顯偏好以及同性婚姻支持態度。同性戀外顯偏好態度包含兩題，係作為個體對同性戀者外顯態度之測量。題目要求參與者評估對同性戀的男、女兩種對象感到溫暖的程度，為 11 點量尺，0 表示非常冷淡，5 表示中立，10 表示非常溫暖，該 2 題相關為 ($r = .27, p < .001$)，平均後分數愈高表示個體對同性戀者有愈正面的外顯態度。在同性婚姻支持態度題目為「你認為同性戀婚姻是否應該透過法律使之有效，從而和傳統婚姻享有同等權利？」，可回答「應該有效」、「沒意見」、「不應該有效」，本研究將此轉換為「-1」表示「不應該有效」，「0」表示「沒意見」，「1」表示「應該有效」。

(3) 人口背景變項。包含參與者的性別、性傾向、年齡、宗教等。其中，將性別轉為虛擬變項分析，女性轉為「0」，男性轉為「1」。對於性傾向係以相關研究建議其連續光譜性 (Bailey et al., 2016; Savin-Williams, 2016)，是以在本研究將異性戀轉換為「-1」，雙性戀則為「0」，同性戀轉換為「1」，以連續變項進行分析。宗教以選單方式回答，包含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無信仰、其他。宗教依照教義中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分為兩種，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為一類（共 235 位，約占總人數 9%），無信仰、道教、佛教歸為另一類（共 2364 位，約占總人數 91%），本研究將該二類進行虛擬變項，其中教義不支持同性戀之宗教信仰為「0」，相對支持同性戀之宗教信仰以及無信仰者為「1」。選擇其他信仰者因無法確定其宗教信仰的教義，故不列入分析。

(二) 研究結果

第一部份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1 所示，整體而言，參與者對同性戀者之外顯與內隱態度都偏正向。其中，同性戀內隱偏好 IAT 之 D 分數 ($M = 0.17, SD = 0.48$) 顯著高於 0, $t(2598) = 18.37, p < .001, d = 0.36$ ，顯示全體樣本對於同性戀者有正向之內隱偏好；同性戀外顯態度亦偏正向 ($M = 6.27, SD = 1.73$)，顯著高於中間值 5, $t(2598) = -37.44, p < .001, d = 0.73$ 。同性婚姻支持態度亦高 ($M = 0.84, SD = 0.46$)，顯著高於中間值 0（表示沒意見）， $t(2598) = 94.05, p < .001, d$

= 1.84。整體而言，就本研究參與者來看，對於同性戀者的內隱態度、外顯態度以及同性婚姻支持均偏正向。

表 1
研究一各變項之相關矩陣及描述性統計量 ($N = 2599$)

變項	1	2	平均數 (標準差)
1. 同性戀內隱偏好 (IAT 之 D 分數)	—		0.17 (0.48)
2. 同性戀外顯態度	.30**	—	6.27 (1.73)
3. 同性婚姻支持態度	.20**	.28**	0.84 (0.46)

* $p < .05$. ** $p < .01$.

以教義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將參與者區分為兩組，檢視其同性戀內隱偏好 (IAT 之 D 分數)、同性戀外顯偏好與同性婚姻支持程度，如表 2 所示。結果發現對於同性戀者的之內隱與外顯偏好均無顯著差異， $t(2597) = 1.53$ 與 1.70 ， $p = .13$ 與 $.09$ ，但對於支持同婚程度則是有教義規範不支持同性戀者皆有較低的趨勢， $t(2597) = 9.68$ ， $p < .001$ ， $d = 0.50$ 。

表 2
研究一不同宗教教義信仰者在同性戀者內隱、外顯與同婚態度

	教義相對支持、無信仰 ($N = 2364$)		教義不支持同性戀 ($N = 23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性戀內隱偏好	0.18	0.48	0.13	0.49
同性戀外顯態度	6.29	1.74	6.09	1.61
支持同性婚姻態度	0.87	0.41	0.57	0.73

第二部分進行調節分析以檢驗宗教教義的影響，係以對同性戀之內隱 (IAT 之 D 分數) 與外顯偏好態度預測同性婚姻支持度，並以宗教教義為調節變項，且同時控制性別、年齡、性傾向等背景變項。於分析上包含所有預測變項之交互作用，即三個二階與一個三階交互作用，且將所有變項中心化 (centering)，並以 Hayes (2017) 之 Process 軟體之模型 3 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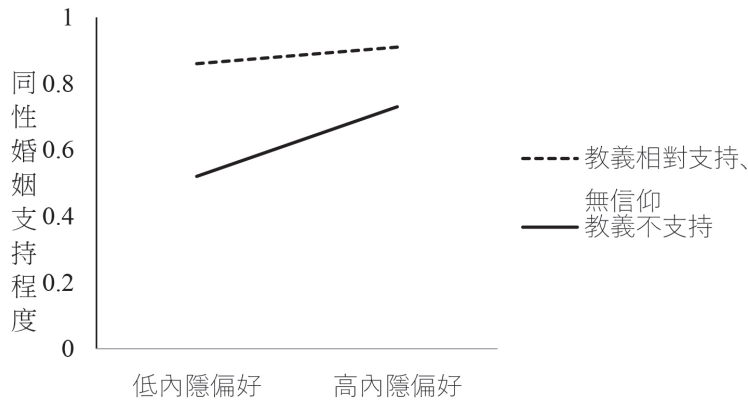
表 3
研究一預測同性婚姻支持態度迴歸分析表

	b	$SE\ b$	t	p
截距	0.79	0.04	19.90	< .001
年齡	0.004	0.002	2.56	.01
性別 (女 = 0 ; 男 = 1)	-0.07	0.02	-3.70	< .001
性傾向	0.06	0.01	-4.59	< .001
同性戀內隱	0.07	0.02	3.46	< .001
同性戀外顯	0.05	0.01	9.29	< .001
宗教教義 (不支持 = 0 ; 相對支持 = 1)	0.26	0.03	-8.31	< .001
同性戀內隱 × 宗教教義	-0.16	0.06	2.48	.01
同性戀外顯 × 宗教教義	-0.07	0.02	3.75	< .001
同性戀內隱 × 同性戀外顯	-0.07	0.01	-7.11	< .001
同性戀內隱 × 同性戀外顯 × 宗教教義	0.02	0.04	-0.51	.61
總體 $R^2 = .16$ ， $F(10, 2588) = 50.32$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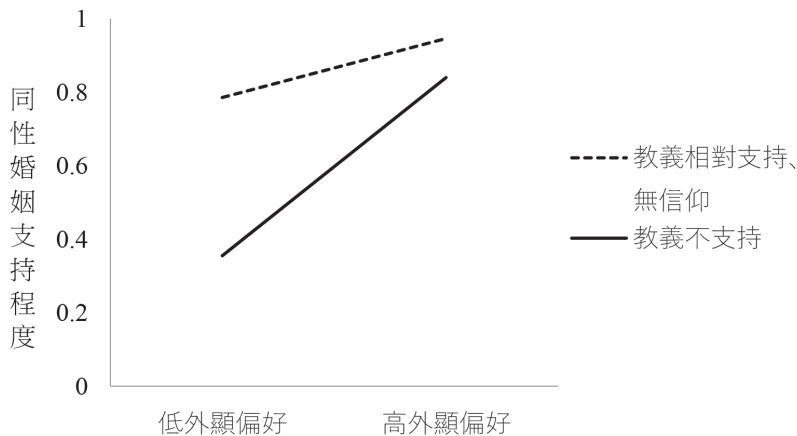
首先，在主要效果上，同性戀內隱偏好顯著（ $b = 0.07, p < .001$ ），即對同性戀內隱偏好愈強，愈支持同性婚姻。同性戀外顯偏好也顯著（ $b = 0.50, p < .001$ ），表示愈覺得同性戀者溫暖，愈支持同性婚姻。最後，宗教教義的效果顯著（ $b = 0.26, p < .001$ ），表示宗教信仰不支持同性婚姻者（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愈不支持同性婚姻。進一步檢驗交互作用發現，在三階交互作用（同性戀內隱偏見 \times 宗教教義 \times 同性戀友好態度）不顯著（ $b = -0.02, p = .61$ ）。之後檢驗二階交互作用發現：宗教教義 \times 同性戀內隱偏好影響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的調節效果顯著（ $b = 0.16, p = .01$ ）。以簡單斜率檢定（simple slope test）進一步分析可發現：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之斜率（ $b = 0.21, p < .001$ ）顯著高於教義相對支持同性婚姻之斜率（ $b = 0.05, p = .01$ ），表示當信仰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若其內隱偏好對同性戀者是偏負向的，其更不支持同性婚姻，如圖 4 最低點所示。

圖 4
研究一同性戀內隱偏好與宗教教義對同婚支持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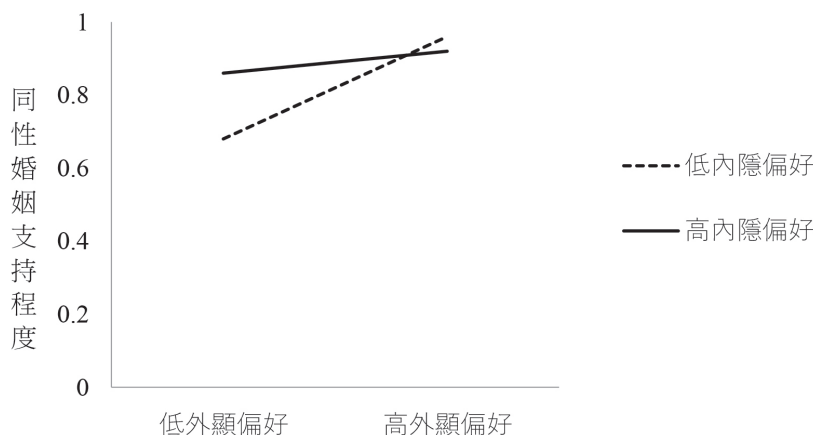
宗教教義 \times 同性戀外顯偏好的交互作用效果也顯著（ $b = 0.07, p < .001$ ），簡單斜率檢定分析發現結果與內隱態度與宗教教義之交互作用效果相似：教義不支持之斜率（ $b = 0.14, p < .001$ ）顯著高於教義相對支持之斜率（ $b = 0.05, p = .01$ ），表示信仰教義不支持同性婚姻，若其同性戀外顯偏好是偏負向的，其更不支持同性婚姻，如圖 5 最低點所示。

圖 5
研究一同性戀外顯偏好與宗教教義對同婚支持的影響



最後，同性戀內隱偏好 × 同性戀外顯偏好對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的調節效果亦顯著 ($b = -0.07, p < .001$)。簡單斜率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低同性戀內隱偏好 ($-1 SD$) 會強化對於外顯態度跟同性婚姻支持度 ($b = 0.20, p < .001$)；高同性戀內隱偏好者 ($1 SD$) 則無此關聯 ($b = 0.05, p = .08$)，如圖 6 所示，當個體對同性戀者之內隱偏好跟外顯偏好最低時，其有最低的同婚支持度。

圖 6
研究一同性戀內隱與外顯偏好對同婚支持度的影響



(三) 小結

研究一以宗教教義作為同性戀內隱和外顯偏好調節同性婚姻支持度提供初步的證據，結果大致符合假設。對於宗教信仰不支持同性戀之參與者，其對同性戀有較負向的內隱或外顯態度時，會最不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此外，不論是同性戀內隱、外顯偏好以及宗教教義，都對於支持同性婚姻有直接的預測力。有趣的是，研究一整體研究參與者在對同性戀內隱偏好是偏向正面而非負面的，係對於同性戀的內隱態度可能趨向友好。但這也可能是 IAT 無法有效捕捉到對於同志內隱偏好的核心特徵，係在研究二將透過 Pinsof 與 Haselton (2016) 的研究典範，使用性濫交和性保守作為 IAT 作業類別，以了解對於同性戀內隱偏好的效果和內部機制。此外，對於外顯態度與對同性婚姻支持的測量也將更進一步的精緻化其測量項目。

研究二

研究二根據研究一的研究結果，首先，欲檢驗不同參與者樣本中於宗教教義調節作用之穩定性，並更進一步探討個體將同性戀者與「性」相關詞彙的聯結程度是否影響同性婚姻支持程度，同時探討傳統家庭價值扮演的中介可能。根據 Pinsof 與 Haselton (2016) 的研究典範，係將同性戀的內隱聯結測驗中「好的詞彙」與「壞的詞彙」等詞類替換為「性保守」與「性開放」兩類詞彙，藉以探討大眾是否因為傾向將同性戀者與特定「性」態度聯結，而影響其支持同性婚姻的程度。更進一步地，若宗教教義的交互作用顯著，則探討宗教教義是否透過傳統家庭價值影響對同性婚姻支持度。

(一) 研究方法

1. 研究參與者

研究二共招募 195 位參與者，扣除三位參與者未完成所有階段研究，共 192 位有效樣本進行分

析。其中 73 位為男性 (38%)，119 位為女性 (62%)，年齡分布為 19 至 35 歲 ($M = 23.36, SD = 3.31$)，信仰傾向為無信仰 97 人 (50.5%)、道教 35 人 (18.2%)、佛教 33 人 (17.2%)、基督教 12 人 (6.3%)、民間信仰 9 人 (4.7%)、天主教 2 人 (1%)、一貫道 1 人 (0.5%)、猶太教 1 人 (0.5%)、其他 2 人 (1%)。

2. 研究程序

研究以網路直接招募參與者，招募網址公告於支援臺大臉書頁面、PTT 的 NTU 板與 Part-time 板等。研究流程共分成兩部分：以電腦軟體測量內隱連結測驗及以電腦填答線上電子問卷，並以隨機方式決定研究參與者進行兩部分的順序。研究完成後，參與者收到 150 元作為參與費用。

3. 研究材料

(1) 內隱連結測驗。採用 PsychoPy 軟體與分析方法 (Peirce, 2007, 2009)。本研究將該程式原定之圖片之刺激材料改為同性戀與異性戀圖片 (圖片材料同研究一)，刺激詞彙改成性保守與性開放兩組詞組。性保守辭彙為：忠誠、貞潔、專情、承諾、相守；性開放辭彙為：濫交、淫亂、放蕩、群交、淫穢。最後以 D 分數計算，分數愈高表示愈趨向性保守，反之分數愈低則是趨向性開放。

(2) 華人傳統家庭價值。選自中央研究院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問卷二期五次及三期二次的家庭價值觀題目。測量臺灣的傳統婚姻、家庭價值信念。分數愈高表示愈認同傳統家庭價值。共 22 題，為五點量表，0 表示不重要，4 表示非常重要。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 = .87$ ，例題如：「為了傳宗接代，至少生一個兒子」、「兒童教養主要是家庭的責任」。

(3) 同性戀外顯偏好。擷選自 Raja 與 Stokes (1998) 所編製的現代同性戀恐懼症量表 (The Modern Homophobia Scale, MHS)，該測驗用於測量個體對同性戀的態度。分為女同性戀 24 題，男同性戀 22 題，總計 46 題。而本研究取個人對其中男、女同性戀兩部份皆有的共通題目共 5 題，為六點量尺計分，1 為非常不同意，6 為非常同意。之後反向計分後，得分愈高表示對同性戀者愈有外顯正向態度，分數愈低則愈負向。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 = .84$ ，例題如：「我不介意跟同性戀者一起工作」、「我歡迎同性戀者成為我的朋友」。

(4) 同性婚姻支持態度。本研究參考鄭玄沛 (2016) 的多元成家態度量表。原量表為研究者與其指導教授根據網路、報章、期刊文獻內支持與不支持多元成家者所提出的意見，加以撰寫編輯。本研究對該量表進行下列三點修改：一、為了使量表之問題順應研究進行時的「同性婚姻平權議題」，而非之前以「多元成家」為訴求的多項法案，將文句中「多元成家法案」改為「修改民法使同性戀者可以進入婚姻」，並將原量表中第三題「多元成家法案其實是合法的雜交派對」刪除；二、為使文句更好理解，將此量表中所使用的「多元性別者」一詞皆改為「同性戀者」；三、最後，研究進行期間，有各種針對同性伴侶的不同版本法條提出，各法條內容各不相同且完整度差異懸殊，為避免混淆，僅測量「支持婚姻平權的態度」，而不將「同性伴侶權益的態度」列入，故將原量表中第五題「伴侶制度有婚姻的法律保障，卻沒有婚姻的不當束縛」刪除。新編改之量表共 11 題，為 6 點量表，1 分為非常不同意，6 分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 = .93$ ，例題如：「同性戀者應可以自由進入婚姻，享有與傳統男女婚姻同樣的法律地位。」

(5) 人口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宗教信仰與性傾向。性別以虛擬變項分析，將女生轉為「0」，男生轉為「1」。宗教信仰以選填方式回答，選項包含：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無信仰、其他 (須自行填答為何種宗教)，宗教部分延續研究一脈絡，依照教義不同轉為兩類虛擬變項分析，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自填其他宗教而教義中不支持同性婚姻者為「0」，佛教、道教、無信仰、其他宗教中教義未涉及同性戀相關規範者設為「1」。性傾向使用 1 至 7 點的連續尺度測量參與者的自陳性傾向。1 代表為完全異性戀者，4 表示雙性戀傾向，7 表示完全同性戀者。

(二) 研究結果

第一部份將同性戀內隱性態度、同性戀外顯偏好、華人傳統家庭價值、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等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如表 4 所示。整體而言，參與者對同性戀者內隱態度偏向性開放 ($M = -0.12$, $SD = 0.39$)，顯著低於 0， $t(191) = -4.35$, $p < .001$, $d = 0.31$ 。對於同性戀之外顯偏好偏正向，($M = 5.42$, $SD = 0.73$)，顯著高於中間值 3.5， $t(191) = -36.24$, $p < .001$, $d = 2.62$ 。重視華人傳統家庭價值的程度亦偏高 ($M = 2.33$, $SD = 0.48$)，顯著高於中間值 2， $t(191) = 9.38$, $p < .001$, $d = 0.68$ 。同性婚姻支持態度也高 ($M = 5.31$, $SD = 0.84$)，顯著高於中間值 3.5， $t(191) = 29.98$, $p < .001$, $d = 2.16$ 。

表 4
研究二各變項之相關矩陣及描述性統計量 ($N = 192$)

	1	2	3	平均數 (標準差)
1. 同性戀內隱性態度	—			-0.12 (0.39)
2. 同性戀外顯偏好	.16*	—		5.42 (0.73)
3. 華人傳統家庭價值	-.04	-.23**	—	2.33 (0.48)
4. 同性婚姻態度	-.22**	.70**	-.30**	5.31 (0.84)

* $p < .05$. ** $p < .01$.

以教義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將參與者區分為兩組，檢視同性戀內隱性態度偏好 (IAT 之 D 分數)、同性戀外顯態度、華人傳統家庭價值與同性婚姻支持度，如表 5 所示。結果發現對於同性戀者的之內隱與外顯偏好均無顯著差異， $t(191) = -0.44$ 與 -1.74 , $p = .63$ 與 $.10$ ，但對於華人傳統家庭價值則是教義不支持同性戀有較高的趨勢， $t(191) = 3.47$, $p < .001$, $d = 0.64$ ，且有顯著較低的同婚支持度， $t(191) = 3.67$, $p < .001$, $d = 0.95$ 。

表 5
研究二不同宗教教義信仰者之變項差異

	教義相對支持、無信仰 ($N = 176$)		教義不支持同性戀 ($N = 16$)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同性戀內隱性偏見	-0.12	0.39	-0.17	0.34
同性戀外顯偏好	5.46	0.70	5.01	1.01
華人傳統家庭價值	2.30	0.48	2.60	0.32
同性婚姻態度	5.37	0.73	4.60	1.47

第二部分依循研究一的脈絡進行調節分析，以檢驗宗教教義的之影響，即以同性戀內隱性態度偏好與外顯態度預測對同性婚姻支持度，並以宗教教義為調節變項，同時控制性別、年齡、與性傾向等人口背景變項。分析步驟上預測包含所有變項的交互作用，即一個三階交互作用，與三個二階交互作用，並對預測變項進行中心化 (centering)。同研究一以 Hayes (2017) 所建立之 Process 的軟體之模型 3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表 6 所示。接著，若宗教教義扮演調節同性戀內隱或外顯態度測同性婚姻支持度有效，則進一步以華人家庭價值觀進行中介化的調節作用分析，此部分將以 Process 的軟體之模型 8 進行。

首先就主要效果來看，同性戀內隱性態度顯著 ($b = 0.26$, $p = .02$)，即個體對同性戀者的連結愈認為性保守，愈支持同性婚姻；相對的，若個體的內隱連結愈認為同性戀者是性開放的，則愈不支持同性婚姻。同性戀的外顯偏好正向預測 ($b = 0.15$, $p < .001$)，當個體對自陳對同性戀者愈有好感，愈會支持同性婚姻。宗教教義的效果顯著 ($b = 0.40$, $p = .02$)，表示宗教信仰有不支持同性戀者，愈不支持同性婚姻。

表 6
研究二預測支持同性婚姻程度迴歸分析摘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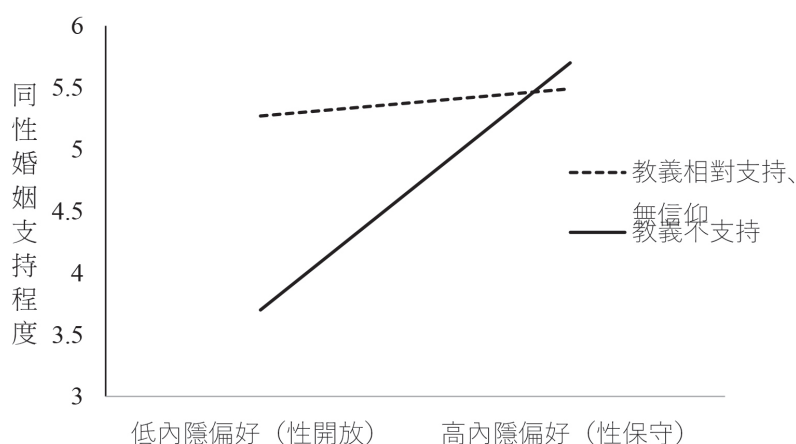
	<i>b</i>	<i>SE b</i>	<i>t</i>	<i>p</i>
截距	4.61	0.31	14.94	< .001
年齡	0.03	0.01	2.01	.05
性別（女 = 0；男 = 1）	0.17	0.09	1.88	.06
性傾向	0.02	0.03	0.70	.48
同性戀內隱	0.26	0.11	-2.41	.02
同性戀外顯	0.15	0.12	12.37	< .001
宗教教義（不支持 = 0；相對支持 = 1）	0.40	0.16	-2.44	.02
同性戀內隱 × 宗教教義	-1.24	0.53	-2.35	.02
同性戀外顯 × 宗教教義	0.02	0.03	-0.59	.56
同性戀內隱 × 同性戀外顯	0.01	0.03	-0.16	.87
同性戀內隱 × 同性戀外顯 × 宗教教義	0.09	0.08	1.07	.29

總體 $R^2 = .57$, $F(10,181) = 24.42$

*** $p < .001$.

第二部分檢驗交互作用項，三階交互作用（同性戀內隱偏見 × 宗教教義 × 同性戀外顯偏見態度）不顯著（ $b = 0.09$, $p = .29$ ）。檢驗二階交互作用發現：同性戀內隱性態度 × 同性戀外顯態度（ $b = 0.01$, $p = .87$ ）及同性戀外顯態度 × 宗教教義（ $b = 0.02$, $p = .56$ ）均不顯著。僅同性戀內隱性態度 × 宗教教義的調節效果顯著（ $b = -1.24$, $p = .02$ ）。以簡單斜率檢定進一步分析可發現，教義不支持同性戀者的宗教斜率顯著（ $b = 2.57$, $p < .01$ ）。此外，教義相對支持者同性戀者的斜率則不顯著（ $b = 0.29$, $p = .06$ ），如圖 7 所示，可見同性婚姻最低點為宗教教義不支持同性戀，且認為同性戀跟性開放的連結強度較強者。

圖 7
研究二同性戀內隱性態度與宗教教義對同婚支持的影響



由於僅有同性戀內隱性態度 × 宗教教義之交互作用效果顯著，故第二部分進一步檢驗宗教教義的調節是否透過華人家庭價值中介，進而影響同性戀內隱性態度而預測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的效果，即是調節化中介效果之檢驗（moderated mediation）。以同性婚姻支持態度作為結果變項，同

性戀內隱偏見作為預測變項，華人家庭價值為中介變項，宗教教義作為調節變項，控制了年齡、性別、性傾向等效果，以 Hayes (2017) 之 Process 中模型 8 進行分析，發現調節化中介效果在 5000 次拔靴法 (bootstrapping method) 結果顯著， $b = -0.24$ ，其 95% 信賴區間不包含 0 $[-0.53, -0.08]$ ，顯示當參與者所信仰的宗教教義不干涉同性戀或參與者無信仰時，其中介效果在 5000 次拔靴法不顯著 ($b = 0.04$ ，95% 信賴區間包含 0 $[-0.01, 0.12]$)；然而若是信仰的宗教教義不支持同性戀，中介效果在 5000 次拔靴法則顯著 ($b = -0.19$ ，95% 信賴區間不包含 0 $[-0.46, -0.05]$)，即信仰宗教教義若不支持同性戀行為，對同性戀的內隱性態度會透過華人家庭價值抑制個體對同性婚姻支持的程度。

(三) 小結

首先，本研究結果與研究一相仿，雖然在同性戀內隱性態度 \times 同性戀外顯偏好以及宗教教義 \times 同性戀外顯偏好這兩項交互作用未顯著，但宗教教義作為同性戀內隱性態度預測同性婚姻支持態度的調節效果仍顯著。當信仰的宗教教義相對支持同性戀或無信仰的參與者，不論其是否傾向將同性戀者與性開放辭彙聯結，對於預測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沒有顯著差異；然而當參與者信仰的宗教教義不支持同性戀時，並且這些參與者傾向將同性戀與性開放類辭彙聯結，則最不支持同性婚姻。再者，研究二調整內隱聯結測驗刺激詞彙類別，結果顯示參與者較容易將同性戀者與「性開放」相關的特質聯結，進而影響了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第三，研究二將傳統家庭價值加入研究進行中介分析，結果發現信仰不支持同性戀的宗教會透過傳統家庭價值降低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

綜合討論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宗教教義是否可作為影響對同性戀之內隱、外顯態度以預測同性婚姻支持度的重要調節變項 (研究一、研究二)，並進一步探討傳統家庭價值作為中介機制之可能 (研究二)。本論文將個體的信仰依照教義區分為「教義涉及不支持同性戀」與「教義內容相對不支持同性戀與無信仰者」兩類，研究一與研究二中都發現宗教教義對於支持同性婚姻的影響效果，且就效果量分析來看 (Cohen, 1992)，都屬於中至高的效果量 ($d = 0.50$ 與 $d = 0.95$)。更進一步地，研究一與二也都穩定發現不同的宗教教義對同性戀內隱偏見與同性婚姻支持度的調節效果。當教義中包含限制同性婚姻相關的內容，並且對於同性戀者存有內隱偏見或與性行為相關的內隱偏見者，會最不支持同性戀者的婚姻權力。

研究一、二中，同性戀內隱偏好、同性戀外顯態度與宗教信仰對於直接預測同性婚姻支持度皆具有穩定性，三者皆有其個別預測的效力。而交互作用項中，以同性戀內隱偏好受到宗教教義的調節最具穩定性，個体外顯的同性戀態度則未得到穩定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內隱態度或許因為可以減少印象整飾、社會期許等其他變異對於態度的影響，故較能穩定地受到宗教教義的調節。此外，研究二中參與者對於同性戀者的外顯態度無論其信仰之教義是否支持同性戀皆偏友善，可能因為青壯年齡層的臺灣地區樣本受到同儕之社會期許影響，使得外顯態度無法顯現出差異，是以不為宗教教義所調節。宗教對於不同態度的調節作用穩定度可能顯示出了內隱態度與外顯態度其實測量了不盡相同的面向。

研究二延伸了研究一的結果，進而探討傳統婚姻與家庭價值如何中介此歷程。依照臺灣目前主要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團體，其理由與傳統婚姻家庭價值有關，故研究假設信仰教義較明確不支持同性戀之個體，是透過傳統家庭價值的中介效果而降低對同性戀婚姻的支持。根據研究二的結果也發現，傳統家庭價值的中介效果僅存在於教義不支持同性戀之個體上。亦即，教義若是不支持同性戀，則個體內在對於同性戀的偏見態度則為影響個體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的關鍵，而這其中的內在運作機制可藉由對於傳統家庭價值的認同程度影響。當教義不支持同性戀的信仰個體愈對同性戀懷有偏見，其可能藉由認同傳統的家庭價值，而愈不支持同性婚姻。

綜上所述，本論文有其貢獻，首先，研究嘗試以虛擬變項區分宗教的教義，而非單純以不同種類的宗教進行分析，結果經由研究一、二的結果，提供教義的內容可能存在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度上有其效力的證據，此分析結果有別於以往單以宗教種類區分的分析。再者，研究二運用兩類與

「性」相關的詞彙進行內隱聯結測驗，檢視本研究的參與者對同性戀者的性開放偏見，比較研究一與研究二的同性戀內隱偏見（IAT 之 *D* 分數），研究一參與者的平均為正值，即參與者對同性戀有正向偏好；然而研究二中，參與者同性戀 *D* 分數則顯著低於 0，顯示出參與者傾向對同性戀者抱持內隱、不被覺察的性開放偏見。此般結果是值得反思的，由於研究二參與者主要為臺灣的 35 歲以下的青壯年，在臺灣社會脈絡下，35 歲以下的人口於同性婚姻相關議題的態度大多傾向支持，研究二中同性戀之外顯態度分數也是偏向正向，顯示研究二的參與者對於同性戀者有非常正向的外顯態度。然而即使是這樣一群個體，仍然對同性戀者抱持不被覺察的性開放偏見，這個結果可能顯示同性戀者在性觀念上被汙名化及標籤化的程度甚深。也正有可能是這樣標籤與汙名，使不熟識同性戀者的個體對同性戀者充滿不容撼動且先入為主的觀念，讓同性戀遲遲無法享有與異性戀相同的權利。根據先前研究（Pinsof & Haselton, 2016），當個體對同性戀者抱有與性開放偏見可預測其對於同性戀婚姻有較低支持度，這也在本研究獲得相似結果。本研究使用特定概念（性開放），而非涵義較為抽象廣泛的好與壞詞類進行內隱聯結測驗，捕捉個體對特定族群（同性戀者）的潛在特定偏見，加深了解參與者對同性戀者偏見的具體內容及方向，這樣的方式也可以延用至測量其他對特定兩類群體的特定汙名比較。

再者，研究二進一步探討臺灣地區年輕人於同性婚姻支持與否的議題上之調節化中介作用，除加入了宗教教義調節，也發現家庭價值觀對支持性婚姻的影響，顯示出教義不支持同性戀者，與臺灣主要不支持同婚團體所主張的相同，即是因為對於家庭價值的認同抑制其對同性婚姻的支持。

最後，本研究存在些許限制，首先是納入分析的人口背景變項有限。在過去的文獻中亦發現，個體的學歷與政治傾向也往往會影響其對同性婚姻的支持態度（Westgate et al., 2015）。臺灣的不同行政區域也是後續相關研究可以加入探討的變項，Westgate 等人（2015）的研究中也提及，不同美國地區也可預測其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然而卻不能確定臺灣是否也存在地區的差異現象。過去也不乏一些例子是每當提到同性婚姻議題，政府官員（如 2017 年 3 月 24 在臺灣舉行亞洲國家中首次的同性婚姻釋憲申請的言詞辯論時，法務部長邱太三之陳述，引自林偉信、陳志賢，2017）認為「北部大都市」與「中南部地區」的臺灣人民對於同性婚姻議題的態度有所差異，不適合貿然賦予性別相同者進入合法的婚姻關係。基於過往研究及時事議題的變項都可列入未來研究分析的目標。

其次為個體與宗教間互動的變項如信仰程度、信仰動機、宗教對個體之意義等應多加考慮。本研究以參與者回報之宗教信仰作為分辨個體受到宗教教義影響的標準，然而這樣未必能完整表徵個體對該宗教的信仰程度、對宗教的認識程度、以及宗教信仰對於個體之意義。個體受到宗教教義的影響可能因為信仰程度、信仰動機、信仰對其意義等諸多不同因素而有所不同，如過往研究指出，當異性戀白人參與者其宗教信仰為外在動機時，對非裔人種的偏見程度及對同性戀者的偏見程度皆高；然當其宗教信仰為內在動機時，對非裔人種的偏見程度較低，但對同性戀者的偏見程度較高（Herek, 1987）。此類相關的變項都可能影響信仰同一個宗教的個體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態度。後續的相關研究宜對宗教的信仰程度、宗教信仰對個體之意義或個體不同的宗教動機進行探討。

此外，同一宗教內可能因系統差異而對同性婚姻相關議題有不同的意見，如基督教會內亦存在與同性戀族群有好的同光教會，而佛教中亦有不支持所有形式性行為的派別。有鑑於此，未來研究也可探討有關各宗教內其細膩的教義，或要求參與者回報其信仰的宗教對於同性戀者的相關規範內容，可較精準區分不同的教義規範。再者，本論文的研究二主要為 35 歲以下的參與者作為研究的對象，無法檢視其他年齡層是否仍然存在傳統家庭價值對的中介效果。建議後續的相關研究可以探討其他年齡層的參與者進行分析。此外其他可能的中介效果變項如「性別角色」亦為值得探討的議題，建議後續的研究中亦可加入探討之。最後，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結果雖然大致接近，但仍有細部不同，主要有可能是因為測量過程中的些許差異，尤其在研究二的外顯量表與內隱測量上都有更精緻化的調整（如量尺點數、題數、IAT 的設計、都在實驗室進行），然而這也是在大樣本（研究一約兩千人）與小樣本（研究二約兩百人）之前的權衡兩難，係以也待未來累積不同規模之資料，更完整地進行如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方能更一窺此中機制的穩定性。

最後，本研究的目的並非意圖分化宗教信仰團體與同性婚姻支持者。自同婚議題於臺灣社會被看見，漸漸受到重視，時至今日成為爭議焦點之一。本研究檢視影響個體支持與否同性婚姻的可能變項。透過研究一、二的發現，宗教的教義扮演影響態度對於支持度的重要調節角色，進而發現傳統家庭價值的中介效果，中介效果僅在教義不支持同性戀者的宗教群體上，如此顯現可能反映了兩

種群體對支持同性婚姻上不同內在心理機制。透過理解此般現象，較能知曉其個體自身態度受到宗教團體可能的影響，在態度研究中也顯示，當個體能知覺其內隱或外顯態度的偏好時，更能對其行為產生覺察並且有所調整，而較不會因自動化歷程而產生行為上的偏誤，誠如 Hahn 與 Gawronski (2019) 近期的研究也顯示，透過覺察 (awareness) 進而認納 (acknowledgment)，更能減緩態度至行為偏好的影響，進而降低兩造可能的誤會和偏見。這樣的發現或許可為兩方的對話開啟交集，且也可以做為未來性別教育和課程之延伸 (蘇苑瑜、劉美慧，2015)，使臺灣社會更和平且多元的討論同性婚姻的相關議題。

參考文獻

- 巫秀珍、郭洪國雄 (2017)：〈原住民同性戀態度之調查研究〉。《人文社會電子學報》，13，45–59。[Wu, H.-C., & Kuo Hung K.-H. (2017). A study on the attitude toward homosex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people.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1), 45–59.]
- 李怡青 (2020)：〈性別平權與婚姻平權：從研究結果反思社會正義〉。《應用心理研究》，72，41–90。[Lee, I.-C. (2020). Gender equality and marriage equality: From research findings to reflections up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72, 41–90.] <https://doi.org/10.3966/156092512020060072002>
- 李容珍 (2017 年 3 月 24 日)：〈【同婚釋憲今公布】後續關心宗教言論自由 反同婚是否被視為歧視？〉。基督教論壇報。 <https://www.ct.org.tw/1307182> [Li, J.-C. (2017, May 24). *Follow-up concerns on religious freedom of speech: Does anti same-sex marriage as discrimination?* Chinese Christian Tribune. <https://www.ct.org.tw/1307182>]
- 林偉信、陳志賢 (2017 年 03 月 25 日)：〈法務部長邱太三：同婚對中南部衝擊大〉。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25000293-260118?chdtv> [Lin, W.-H., & Chen, C.-H. (2017, March 25). *Minister of Justice Chiu Tai-san: Tong-hun dui zhong-nan-bu chong-ji-da*. China Times.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25000293-260118?chdtv>]
- 林佩薇、郭洪國雄 (2017)：〈高雄市國小教師同性戀態度之調查研究〉。《人文社會電子學報》，12 (2)，79–94。[Lin, P.-W., & Kuo Hung K.-H. (2017). A study on the teacher'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of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in kaohsiung c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2), 79–94.]
- 林珮婷 (2020)：〈誰支持婚姻平權？探索臺灣婚姻平權的支持基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 (2)，207–238。[Lin, P.-T. (2020). Who supports same-sex marriage? Exploring the mass bases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issue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2(2), 207–238.]
- 張淑芬 (2017)：〈融入基督宗教靈性觀之心理諮商歷程分析：以家庭關係諮商為例〉。《教育心理學報》，49 (2)，243–266。[Chang, S.-F. (2017). Integrating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nto Counseling: An analysi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counseling proces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2), 243–26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4](https://doi.org/10.6251/BEP.2017-49(2).0004)
- 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 (2013)：〈大學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人際關係態度之調查研究〉。

- 《教育心理學報》，44，411–432。[Chang, T.-S., You, C.-S., & Wang, C.-S. (2013).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gay and lesbian peer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 411–432.] <https://doi.org/10.6251/BEP.20110524>
- 黃軍義、許得洋（2021）：〈遭遇性侵害經驗、強暴迷思、與性別偏見對男同志做出性侵害行為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52，337–364。[Huang, J.-Y., & Hsu T.-Y. (2021). Effects of experiences of sexual assault, rape myths, and gender biases on sexual assault perpetrated by homosexual men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337–364.]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5](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5)
- 葉德蘭（2017）：〈良言傷人，六月亦寒：臺灣反對同性婚姻網路言論探析〉。《考古人類學刊》，86，69–110。[Yeh D.-I. (2017). Good words hurt too: The cyber discours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6, 69–110.] <https://doi.org/10.6152/jaa.2017.6.0004>
- 鄭玄沛（2016）：《性別歧視、族群偏見、宗教偏見、多元成家態度、與強暴迷思的關係》（未出版碩士論文），玄奘大學。[Cheng, H.-P. (2016).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xism, ethnic prejudice, religious intolerance, attitudes of diverse family formation, and rape myth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 鄭旭博（2013）：《嫌惡型男同性戀歧視：情境規範與訊息順序的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Cheng, H.-P. (2013). *Aversive gay male discrimination: The impact of context norm and order effec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蘇苑瑜、劉美慧（2015）：〈性別化的課程轉化：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的性別議題教學〉。《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3（3），1–37。[Su, Y.-Y., & Liu, M.-H. (2015). Gendered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The teaching of gender issues of high school's civics and society teacher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3(3), 1–37.] <https://doi.org/10.6151/cerq.2015.2303.01>
- Adamczyk, A., & Pitt, C. (2009). Shaping attitudes about homosexuality: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2), 338–351. <https://doi.org/10.1016/j.ssresearch.2009.01.002>
- Bailey, J. M., Vasey, P. L., Diamond, L. M., Breedlove, S. M., Vilain, E., & Epprecht, M. (2016). Sexual orientation, controversy, and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7(2), 45–101. <https://doi.org/10.1016/10.1177/1529100616637616>
- Banse, R., Seise, J., & Zerbes, N. (2001).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ity: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IAT.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8(2), 145–160. <https://doi.org/10.1026//0949-3946.48.2.145>
- Charlesworth, T. E. S., & Banaji, M. R. (2019). Pattern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I. Long-term change and stability from 2007 to 2016.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2), 174–192. <https://doi.org/10.1016/10.1177/0956797618813087>
- Chen, E. E., & Chang, J.-H. (2020). Investigat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sexual minorities in Taiwan.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7(2), 197–207. <https://doi.org/10.1037/psg0000045>

- [org/10.1037/sgd0000362](https://doi.org/10.1037/sgd0000362)
- Cheng, Y.-H. A., Wu, F.-C. F., & Adamczyk, A.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5. <https://doi.org/10.1016/10.1080/21620555.2016.1199257>
- Chonody, J., Woodford, M. R., Smith, S., & Silverschanz, P. (2013). Christian social work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s and gay men: Religious teachings, religiosity, and contact. *Journal of Religion &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Social Thought*, 32(3), 211–226. <https://doi.org/10.1080/15426432.2013.801730>
- Cohen, J. (1992). A power prim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1), 155–15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2.1.155>
- Donaldson, C. D., Handren, L. M., & Lac, A. (2017). Applying multilevel modeling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 and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 people across 28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8(1), 93–112. <https://doi.org/10.1016/10.1177/0022022116672488>
- Greenwald, A. G., Poehlman, T. A., Uhlmann, E. L., & Banaji, M. R. (2009).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II. meta-analysis of predictive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1), 17–41. <https://doi.org/10.1016/10.1037/a0015575>
- Greenwald, A. G., & Banaji, M. R. (1995).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1), 4–27. <https://doi.org/10.1016/10.1037/0033-295X.102.1.4>
- Greenwald, A. G., & Farnham, S. D. (2000).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measure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6), 1022–103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9.6.1022>
-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K. (1998).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6), 1464–1480. <https://doi.org/10.1016/10.1037/0022-3514.74.6.1464>
- Greenwald, A. G., Nosek, B. A., & Banaji, M. R. (2003).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3), 481–48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2.197>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2nd ed.) Guilford Press.
- Hahn, A., & Gawronski, B. (2019). Facing one's implicit biases: From awareness to acknowle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6(5), 769–794. <https://doi.org/10.1016/10.1037/pspi0000155>
- Haddock, G., Zanna, M. P., & Esses, V. M. (1993). Assessing the structure of prejudicial attitudes: The case of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6), 1105–1118. <https://doi.org/10.1016/10.1037/0022-3514.65.6.1105>
- Herek, G. M. (1987).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prejudice: A comparison of racial and sexual

-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3, 34–44. <https://doi.org/10.1016/10.1177/0146167287131003>
- Herek, G. M., & Capitano, J. P. (1996).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Intergroup contact, concealable stigma, and heterosexuals’ attitudes toward gay men and lesbia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4), 412–424. <https://doi.org/10.1016/10.1177/0146167296224007>
- Herek, G. M., & McLemore, K. A. (2013). Sexual prejudi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 309–333. <https://doi.org/10.1016/10.1146/annurev-psych-113011-143826>
- Lin, C., Moore, D. D., Nylund, D., & Espinoza, S. A. (2020). Clinical issues among Chinese gay men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LGBT Issues in Counseling*, 14(1), 18–37. <https://doi.org/10.1080/15538605.2020.1711290>
- Morrison, M. A., & Morrison, T. G. (2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measuring modern prejudice toward gay men and lesbian wome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3(2), 15–37. https://doi.org/10.1300/J082v43n02_02
- Nosek, B. A., Hawkins, C. B., & Frazier, R. S. (2011).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From measures to mechanism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4), 152–159. <https://doi.org/10.1016/10.1016/j.tics.2011.01.005>
- Oforu, E. K., Chambers, M. K., Chen, J. M., & Hehman, E. (2019). Same-sex marriage leg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implicit and explicit antigay bi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18), 8846–8851. <https://doi.org/10.1073/pnas.1806000116>
- Olson, L. R., Cadge, W., & Harrison, J. T. (2006). Religion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same-sex marriag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7, 340–360. <https://doi.org/10.1016/10.1111/j.1540-6237.2006.00384.x>
- Peirce, J. W. (2007). PsychoPy—Psychophysics software in Pyth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 162(1), 8–13. <https://doi.org/10.1016/j.jneumeth.2006.11.017>
- Peirce, J. (2009). Generating stimuli for neuroscience using PsychoPy. *Frontiers in Neuroinformatics*, 2, Article 10. <https://doi.org/10.1016/10.3389/neuro.11.010.2008>
- Pinsof, D., & Haselton, M. (2016). The political divide over same-sex marriage: Mating strategies in confli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4), 435–442. <https://doi.org/10.1016/10.1177/0956797615621719>
- Raja, S., & Stokes, J. P. (1998). Assessing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s and gay men: The Modern Homophobia Scale. *Journal of Gay, Lesbian, & Bisexual Identity*, 3(2), 113–134. <https://doi.org/10.1023/A:1023244427281>
- Rich, T. S., Dahmer, A., & Eliassen, I. (2021). Unpacking the roles of religion and partisanship on support for same-sex marriag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6(2), 364–381. <https://doi.org/10.1177/0021909620918396>
- Ryan, W. S., & Blascovich, J. (2015). Measures of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orientation: Heterosexism, homophobia, and internalized stigma. In G. J. Boyle, D. H. Saklofske, & G. Matthews (Eds.),

-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 (pp. 719–751).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B978-0-12-386915-9.00025-5>
- Savin-Williams, R. C. (2016). Sexual orientation: Categories or continuum? commentary on Bailey et al. (2016).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7(2), 37–44. <https://doi.org/10.1177/1529100616637618>
- Tankard, M. E., & Paluck, E. L. (2017). The effect of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 regarding gay marriage on social norms and person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9), 1334–1344.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7709594>
- Todd, N. R., & Ong, K. S. (2012).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orientation as moderators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igious attenda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gay marriage for White Christian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4(1), 56–70. <https://doi.org/10.1037/a0025142>
- Whitley, B. E. (2009). Religios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s and gay men: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9(1), 21–38. <https://doi.org/10.1080/10508610802471104>
- Westgate, E. C., Riskind, R. G., & Nosek, B. A. (2015). Implicit preferences for straight people over lesbian women and gay men weakened from 2006 to 2013. *Collabra*, 1(1), Article 1.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8>
- Wright, L. W., Adams, H. E., & Bernat, J. (199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Homophobia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1(4), 337–347. <https://doi.org/10.1023/A:1022172816258>

收稿日期：2020 年 04 月 13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0 年 04 月 14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0 年 08 月 03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0 年 12 月 01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0 年 12 月 2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1, 53(1), 151–17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Moderating Role of Religion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on Opinions Same-Sex Marriage: A Study from Taiw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Database

Cheng-Yi T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en-Ho Ch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y December 2020, 29 countries (or jurisdictions within them) had legalized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the issue of same-sex marriage was not taken seriously in the past, but i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In 2017, the chief justice of Taiwan ruled that prohibiting same-sex marriage was unconstitutional, and this ruling required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establish laws allowing same-sex marriage by 2019. However, the result of a referendum in 2018 opposed the recogni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This result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religion and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s opposing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have religious backgrounds, especially Catholicism and other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Although such organizations do not present their religion as the main reason for opposing same-sex marriage; they claim to want to protect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fulfilling familial obligations by hav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and monogamy (in contrast with promiscuity and sexual openness). More importantly, religious individuals have stro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and may behave accordingly.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religious belief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with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ttitudes (bo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and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in Taiwan may be enhanced by religious beliefs that do not support same-sex relationships (such as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addition, this moderation may be mediated by the endorsement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Therefore, this study evalua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endorsement of family valu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For Study 1, 2599 Taiwanese participants (69% female; mean age = 24.09 years, $SD = 5.12$) were recruited from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database. After providing thei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ir gender, age, and relig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their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wo items, $r = .27$)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whether they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only one item).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religious belief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of both implicit ($b = 0.16, p = .01$) and explicit attitudes ($b = 0.07, p < .001$) toward homosexuality with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Among individuals following religions (e.g., Christianity or Islam)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 homosexuality was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21, p < .001$), whereas, among those without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 homosexuality was weaker associated with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05, p = .01$). Moreover,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creased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 attitude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14, p < .001$), whereas, for people with religious beliefs not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explicit attitude toward homosexuality had a lower association with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05, p = .01$).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of Study 1 support our hypothesis that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creas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o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Study 2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f Study 1 by using comprehensive and validated measurements for both the IAT and survey scales. In addition, the IAT was modified: The original questions about abstract concepts (good vs. bad) were replaced with ones on sexual openness (promiscuity vs. monogamy). For Study 2, 192 participants (62% female; mean age = 23.36 years, $SD = 3.31$) were recruited. After providing thei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ir gender, age, and relig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five items, Cronbach's $\alpha = .84$),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hav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paren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22 items, Cronbach's $\alpha = .87$), and their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11 items, Cronbach's $\alpha = .93$).

The results of Study 2 revealed that religious belief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and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b = -1.24, p = .02$) but not explicit attitudes ($b = 0.02, p = .56$). Simple slop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or those with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promiscuity bias increa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licit attitudes and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b = 2.57, p < .01$), whereas for those without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promiscuity bias was not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29, p = .06$). Furthermore, a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which belief in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was the mediator of the effect of relig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s and same-sex marriage stance. The results of 5000-iteration bootstrapping indicated moderated mediation ($b = -0.24, 95\% \text{ CI}, -0.53, -0.08$). Follow-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or those with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implicit attitudes continued to predict their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b = -0.24, 95\% \text{ CI}, -0.53, -0.08$). However, for those with religious beliefs not opposing same-sex relationships, this indirect path via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did not represent a mediation effect ($b = 0.04, 95\% \text{ CI}, -0.01, 0.12$).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of Study 2 support our hypothesis of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relig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opinions on same-sex marriage in the presence of promiscuity bias. Specifically, religious beliefs opposing same-sex marriage increased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ttitude and opinion on same-sex marriage. Furthermore,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ttitude and same-sex marriage that was moderated by religious belief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that may build a bridge between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and help them to communicate, thereby reducing tension in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same-sex marriage, implicit attitude, explicit attitude, religion,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